

大汶口文化：黄河下游考古的重要收获

乘丰实

走过百年的中国考古,以自己的方式命名了众多的考古学文化。很多原本极其普通的小地名因为与重要的考古学文化相关而著名起来,比如大汶口。

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和确立,是新中国考古学发展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这一文化将我国东方地区已知的史前历史由龙山文化提前了1500余年。持续的考古也揭示了大汶口文化由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完整发展过程,从而为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提供了实证。

不断丰富的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的空间分布以泰沂山为中心,包括黄、淮下游的山东全省、江苏和安徽北部以及河南东部等广大地区,面积超过20万平方公里。时间上可以划分为3个时期,早期距今约6000—5500年,中期约距今5500—5000年,晚期约距今5000—4500年。

1959年,为配合津浦铁路复线工程,考古学家在山东泰安大汶河南岸的堡头村西,发掘133座史前墓葬。墓葬内的随葬品丰厚而精美,墓葬之间差别巨大。出土文物随后在北京新落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引发极大关注。

1962年,曲阜夏夏遗址的发掘,从考古学层面上确定了以大汶口墓地为代表的遗存早于龙山文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适时提出“大汶口文化”的命名。利用我国公布的第一批碳14测年数据,夏鼐把大汶口文化的绝对年代推定在公元前4300—2300年之间。

1974年,考古报告《大汶口》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同时还刊载了莒县陵阳河遗址采集的几件陶器刻画图像。依据这些新的考古资料,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于1976年发表了《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的文章,掀起探讨大汶口文化社会性质的热潮,先后发表论文30余篇,拉开了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的序幕。1979年,山东省博物馆主持发掘莒县陵阳河等遗址,第一次发现出土图像文字的大型墓葬。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唐兰、李学勤、裘锡圭、高明等,先后研究了陵阳河等遗址出土的图像文字,认为与甲骨文为代表的早期汉字存在密切关系。

21世纪以来,围绕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研究,关于大汶口文化的考古工作重心转向了聚落,在多处发现大汶口城址和反映社会结构变化的贵族墓地。其中2017年发现的章丘焦家大汶口中期城址和墓地被评为当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其实海岱地区存在比大汶口文化更早的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时期,此时属于原始农业时期,人口数量不多,属于典型的地广人稀,加上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采集和渔猎构成此期人们主要的生计方式,而农业经济还处于一种补充的地位。从大汶口文化开始,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考古为我们提示出这一演进过程。

多姿多彩的文明内涵

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人口数量和分布密度都有所加大,分布区内的生业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环境较好的部分地区,如地处东部沿海的胶东半岛和鲁西邻近湖泊地区,渔猎经济仍然是最重要的生计方式。如胶东半岛沿海的遗址,堆积中保存着大量贝壳和动物骨骼,俗称“贝壳”。而这种以采集和渔猎为主要生计方式的遗址广布于沿海地区。内陆的临湖地带也有类似情况。多数地区的农业经济有了一定发展,逐渐成为人们食物的重要来源。

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业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农作物方面,除了此前已经驯化的旱作农作物粟和黍,还从南方传来水稻,甚至独立驯化了野生大豆,使之成为“五谷”的重要成员。从这一时期的良渚文化发现规模宏大的水坝和成规模的“井”字形稻田来看,与其同等发展水平的大汶口文化,也应该存在较大规模的农田和水利设施。来自南方的稻作农业经济,落地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之后,又与其他文化因素一起跨过渤海海峡,传播和扩散到辽东半岛甚至更远的东北亚地区,为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大汶口文化最突出的手工业生产为玉器、骨牙器工艺和陶器生产等。

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东部地区形成了北(红山系)、中(大汶口·龙山系)、南(良渚系)三大玉器文化系统。大汶口文化早期的玉器数量不多,到中晚期呈现爆发式增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玉器文化。大汶口玉器多为片状玉器,开料技术由以线切割为主向片切割为主过渡;玉器的功能由装饰为主转向礼仪和装饰并重;玉钺、玉刀、玉璧和玉璋是之后的二里头文化玉礼器的主要来源。

大汶口文化的骨牙制作技艺亦达到空前的水平。大象、鹿类、野猪、熊等大型动物的骨骼和牙齿,都被精工细雕,采用切割、研磨、雕刻、镂空、钻孔等工艺。大汶口墓地出土的象牙梳和骨雕筒,雕镂各种花纹,并镶嵌以绿松石等彩色石饼,叹为观止。

大汶口文化用瓷土烧成的洁白陶代表了我国甚至世界古代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陶器是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经过数千年的探索,到大汶口文化时期,陶器的制作工艺和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以白、黑、红三色绘就的各种复杂彩陶图案,在早期阶段就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快轮拉坯成型技术的发明,使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龙山文化的陶器制作,登上了中国陶器制作的高峰。

在大汶口文化早期,聚落群的内部开始产生分化,出现中心聚落与一般聚落的差别。也就是说,多数区域开始进入大小两级结构的初级分层阶段,部分发达地区出现了大中小三级结构的聚落形态。较大的中心聚落一般构筑



有防御性质的壕沟,普通的小聚落则没有防御设施。

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聚落群的规模继续扩大,表现为金字塔状结构的三级聚落形态成为流行模式;中心聚落,在原有环壕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有城墙的新聚落;环壕城址。考古学家目前在海岱地区发现的大汶口城址至少有6座,遍布于山东和苏皖北部地区,包括鲁北的章丘焦家、鲁南的滕州岗上、皖北的固镇城下、鲁东南的日照尧王城和五莲丹土、苏北的连云港藤花落等遗址。这种由城、壕沟和普通聚落构成的三级结构的聚落形态,可以与文献记载的“都·邑·聚”模式的早期国家结构相对应。

泰安大汶口、章丘焦家、邳州花厅和莒县陵阳河等遗址,均发现成片分布的大汶口中晚期墓地。墓地内的墓葬既有棺椁齐备、随葬品丰厚、高端礼器充盈的大、中型墓葬,也有一些如洗的普通小墓,证明当时社会的阶层分化非常突出。

交流互动从未停止

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在大汶口文化时期达到一个高潮。

中原地区的庙底沟彩陶艺术极大丰富了大汶口文化的内涵。在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东方地区的彩陶数量和纹样、图案及色彩种

类,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大汶口人在吸收外来因素的同时,很快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和风格的彩陶艺术,如多种彩色绘就的八角星、云雷纹以及各种风格的几何纹形纹样等。

随着实力的增长,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开始增强。在早期阶段,大汶口文化还局限于京杭大运河一线的西侧。中期开始,大汶口人掀起了一个向西部中原地区迁徙和发展的浪潮,占据了皖北和鲁西南地区,并迅速推进到豫东的商丘和周口地区,极大拓展了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域。而文化传播的区域更远,到达了豫中的郑州至平顶山一线,在一些仰韶文化晚期和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典型的大汶口文化遗物。在豫西陕东、晋中南、豫南和鄂西北等广大地区,也有它的文化因子,我们据此可以画出一张大汶口文化西渐图。

不同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共同促进了区域文化的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

(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

文明之声

清镜：百子呈祥



此次展览展出了一面清代百子图镜,亦称婴戏纹镜。镜为圆钮,钮顶平面铸七字楷书阳铭“湖州薛晋侯自造”。镜钮上、下形成一条纵向中轴线,自上而下安排了四组分量最重的人物组合,分别为五子夺魁(盔)、两子相向而立执笔与执如意、三子盘腿而坐斗草、四子围坐裁纸习书。在其外侧,布置单人、双人、山石及花草。左上角立有两子,分别执荷花、捧盒,“荷”与“和”谐音,“盒”通“和”,有“子孙和合”的寓意。其下方童子一人,肩扛长戟,下坠一磬,“戟”与“吉”音同,“磬”即“庆”音,暗合“吉庆有余”的意象。左下角一童子手持桂枝,下坠绶带,“桂”音通“贵”,“绶”同“寿”,或有“贵寿无极”之意。

该镜通体呈灰褐色。镜背以白描手法单线勾勒,铸出人物、植物及山石形象,儿童形象突出,共计32人。此镜在构图上独具匠心,以镜钮为中心,大致分为内、外两区来布置人物形象,分布均匀,疏密有致,组成一幅生动活泼的《百子图》,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在此类题材的百子图镜中实属罕见。

汉、唐、宋、清,不同风格的镜子,静静陈列于国家博物馆,无言诉说着岁月的流逝。尤其是“中国大宁,子孙益昌”的镜上铭文,穿越时空,表达出古人的美好心愿。

铜镜文化的魅力

霍宏伟文并图

域,铺满连绵不断的云气纹,使得整个镜背呈现出繁复复杂、密不透风的特点。

二是博局纹之外有一周铭文带,包括52字篆书阳铭,其中有“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常(裳)元吉,有纪(刚)”。铭文中“中国大宁,子孙益昌”一句,表达出汉代人期盼华夏康宁、世代昌盛的美好愿望。

三是铸造工艺,在该镜背进行了鎏金这一特殊工艺加工,使之更具有灿然夺目的美感。此类汉代鎏金博局镜,在湖南、江苏、广西等地发现相对较多,在中原地区出土极少。

唐镜：花舞大唐



在“镜里千秋”特种工艺镜展柜中,展出一面唐代金平脱羽人花鸟镜。该镜为圆钮,以金银片镂刻四重八瓣莲花纹钮座。钮座外分为内、外两区。内区自钮座四面正中,向外各伸出一心形花瓣纹,其间满饰花鸟、飞蝶。外区接近镜缘,四面正中分别饰以羽人、鸾凤各二,相间分布,呈顺时针方向排列,其间饰以花鸟。直

汉镜：“中国大宁”



1952年,在湖南长沙北郊伍家岭发掘出土一面鎏金中国大宁四神博局镜,这面镜子在纹饰、铭文及工艺三方面都有独特之处。

一是纹饰布局,四叶纹钮座外围以双线方框。框外四隅各置一枚乳丁,其间以双弦纹圈相连。方框外四面正中为T形纹,与其外侧的L形纹相对,方框四隅外与V形纹相对,由此形成博局纹四方八极的经典图式。框外置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并与其他神兽构成组合。青龙、白虎、双角兽的形象设计大胆、新颖,突破了内外区的界限。四神及其他形象之外的空白区

正确理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丰富内涵,是中国考古学繁荣发展的基本前提。我们可以从4个方面理解中国考古学的特色。

筑牢中国理论之基。考古学是一门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具有鲜明的历史学属性。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唯物史观也逐渐进入中国考古界的视野。1930年,郭沫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融文献记载、甲骨文和金文材料于一体,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考古学界的代表性学者夏鼐和苏秉琦都自觉地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倡导在正确史观引导下,实现从“为考古而考古”到“为历史而考古”的转变。经过30多年的发展,到上个世纪80年代,“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考古学的“中国学派”宣告成立。新中国历史和考古学取得的重大成就充分证明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我们研究历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发现历史和解释历史是考古学的基本职责,以史育人是考古学的重要使命,什么样的史观就会导致什么样的历史解释和历史书写。广大考古工作者只有不断加强理论修养,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本学科材料的有机结合,才能构建起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体系。

探索中国方法之用。经过几代考古学者的工作实践和不懈探索,中国考古学在田野发掘、年代测定、成分分析和文物保护等领域的手段不断成熟规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考古学技术体系,诸如土遗址和有机质文物的发掘与保护技术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领先地位,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以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基础的田野发掘技术为例,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殷墟考古发掘中,以梁思永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者既充分借鉴西方考古地层的长处,更从中国古代遗址的具体实践出发,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发掘方法并传承至今。在理论方法层面,以苏秉琦、俞伟超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者以器物类型学分析为基础,开创性地提出了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新时代的考古工作者要坚定学科自信,博采众长,守正创新,围绕“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的根本任务,大力开展学科交叉和学科整合研究,积极探索新技术新方法在本学科中的运用,特别是在田野发掘技术、考古信息提取、文物成分分析、科技检测手段、遗迹遗址保护、历史场景复原以及考古历史融合等关键领域不断拓展和完善新方法。

凝练中国问题之核。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中国考古学者第一铲就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1930年,受蔡元培、傅斯年的委派,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梁思永不远千里,奔赴黑龙江齐齐哈尔,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昂昂溪遗址,命名了昂昂溪文化,在关键的时刻,用出土文物实证了东北地区的文化溯源。上个世纪70年代,随着考古材料的大量累积,苏秉琦提出中国考古学要聚焦“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重大问题。

身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了解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古国的发展脉络和历史规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从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中寻找治国理政的智慧。考古工作者要立足田野一线,通过对考古材料的深入理解,凝练重要问题,做关乎民族复兴和文化自信的学问,当识大体、陈大义、有关怀、能担当的学者,把考古学科建设成视野宽广、格局宏阔的学科。

阐释中国文明之美。人类文明一道充满了多样性,每一种文明都诞生于特定的时空背景,形成了自身的文化传统,散发着独特的文化魅力。考古研究表明,诞生在世界东方的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是人类文明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历经文化谱系构建和古史重建之后,中国考古学的学科重心必然要转向文明阐释的主战场——“凝练文明基因,阐发传统价值,厚植文化自信,助力民族复兴”是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重要使命。

考古学者要善于运用考古学的手段,科学挖掘蕴含在中华文明瑰宝中的优秀文化基因,深入研究中华民族的文化脉络,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及其在人类文明中的重大贡献,华文明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传统,推动人类文明走向“美美与共”。

(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中国考古学的特色与风格

孙庆伟

